

张恒寿著

中國社會與思想文化

人民出版社

9.31

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

王康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倪天煦

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

ZHONGGUO SHEHUI YU SIXIANG WENHUA

张恒寿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秦皇岛市卢龙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875印张 379,000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ISBN 7-01-000586-9/K·172 定价10.00元

自 序

五十年代以来，写过一些有关历史和哲学的文章，由于内容平常，数量很少，一向没有编辑成册的意愿。一九七七年后，在争鸣空气的高涨下，又写了几篇有关哲学史的文章。当时写作的心情，比二十年前更为兴奋愉快，但写作的精力大感减退，因此想到乘此精神还未枯萎之时，把写过的文字编为一集，以便翻阅检查，回顾走过的道路和足迹，对于个人来说，还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如果其中有些见解可供后来研究者的参考，或从讨论的问题中，可以反映出某一阶段的时代趋向，将会更有意义些。于是在朋友们的督促支持下，编成了这部论集。

1982年秋，开始整理编选时，除将若干考证庄子的文章，归入《庄子新探》一书外，共选了正文十篇，附录四篇；1986年加入《章太炎对于二程学说的评论》和《论宋明哲学中的“存天理、去人欲”说》两文；现在又将近作《顾宪成简论》、《严复对于当代道学家和王阳明学说的评论》和《王夫之天人学说探微》三文，和两篇开会发言的短文，一并编入，这样全书正文一共为十七篇，附录四篇。根据各篇文章的内容，定名为《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十七篇正文，分为社会史和思想文化史两大部分，书中的前两篇（即《试论两汉时代的社会性质》和《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讨论中的若干问题》）是有关中国社会史的讨论；后十五篇，除《论子产的政治改革和天道、民主思想》一文的前半篇属于社会政治史范围外，其余全是关于思想文化史的论

述。在思想史各篇中，分先秦两汉、宋明理学和近现代评论三小部分。目次的顺序，除两篇关于历史的论文，排列在前外，其余部分大体是按照文字内容的时代排列的。实际写作的时代，则先后不一，其具体情况，大体是这样的：

二十年代我上大学时，曾念过历史系，但研究兴趣总偏在哲学思想方面。但在正式研究一些哲学史的问题时，才真感到思想史上的问题，不能单在思想史上解决，必然要追寻到有关思想倾向的社会基础上，因此自己的研究课题，又从哲学方面回到历史社会方面来。

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也即古代史社会分期问题，是各种社会科学都要涉及而必需理解的问题，也是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春秋战国的社会变化，尤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这一问题的圆满解决，难度较大，不论在理论上、材料上都没有达到圆满解决的时机，自己还没有解答这一问题足够条件，所以虽有些初步设想，却不敢作正面论述。不过在问题的侧面，比如从战国社会的演变发展上，探寻一些解决的线索，还较易着手。当时报刊上若干主张汉代是奴隶社会的文章，我正在讲授秦汉史课程，便结合教学工作，写了《试论两汉时代的社会性质》一文，作为解答古代史性质的一个预备步骤。论文是1957年3月写成的，5月在中国科学院第二次学部委员会史学组上列席讨论过。（1957年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曾调我到该所工作，河北天津师院只同意在哲学所任兼职研究员，从事研究。冯友兰先生是哲学所中国哲学史组组长，同意我把学校的论文题目，作为哲学所的兼职研究员题目，便将《试论两汉社会性质》一文推荐到学部委员会上列席讨论。）报告讨论后，应《历史研究》编辑部之约，将原文压缩了一小半，于1957年9月登载在《历史研究》第九期上。（本书所载，仍为全文。）这时正是反右运动

达到高潮时期，学术界已没有认真研究的空气和充分讨论的时机了，自己对汉代社会的研究，也就停止在这里，没有作进一步的深入钻研。

经过反右、大跃进运动后，1961、62年间，运动风浪有一度的暂时平静，这期间史学界发表了许多讨论土地国有制的文章，这一问题和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阶级分野，都有关涉，引起我的思考兴趣。在阅读这些论文的过程中，感到争论双方所引的材料相当丰富了，但有些争论没有提到理论高度加以分析，因此双方争执纠缠不清，如主权和所有权的同异，地租和地税的同异，自耕农有没有所有权问题，都没有得到澄清，因此得不到大体一致的结论。在几次教研组及其他讨论会上，我提过一些不同意土地国有制的看法，后来有一位同事对我说，你所说的那些观点，有些论文都已谈到了，只有关于“法律观念和经济事实”的关系，还没有看到有人讲过，可以正式写一篇论土地国有制的文章，把这几个论点讲的再清楚点。正遇北京史学会开第二次年会，号召大家撰写文章，我就写了《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讨论中的若干问题》一文，提交大会。这一文的前半篇是根据平常会上谈到过的几个观点，比较系统地综合而成，后半篇是对于两篇主张汉唐土地国有制的文章提出商榷性的意见。在北京史学会讨论后，发表在1962年《历史研究》第二期上（以后又在《北京史学会年会论文选辑》登载过）。当时这一争论大体上近于结束，主张土地国有制的论文，不多见了。自己的研究课题，也转到别的方面，没有再事研究。

以上是两篇历史文章的写作经过。

以下十五篇哲学文章的写作经过是这样的：

1957年1月，我由张岱年同志介绍参加了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在会上我就中国哲学史上唯心、唯物主义斗

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发言之后，在座的《人民日报》记者要我将发言内容写成文章，于1957年2月4日在该报上登出，即本书中的论文《关于中国哲学史中唯心、唯物主义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这一发言的内容和当时通行的看法有些不同，在会上和会后，曾得到一些同志的赞同，但文章发表几个月后，在期刊上看到一些不指名的批评，究竟学术界大多数人的意见如何，我不知道，我自己却一直保持这一看法，没有改变。直到三中全会后，从报刊上的许多论文和一些会议上的发言中，知道大体相同于此文的意见逐渐多起来了。这在心情上是一个安慰。但惭愧的是在发表此文后十几年中，并没有根据自己提出的方法，对历史上的思想家进行深入研究，写出成果。

在中国哲学史讨论会开过后，正当史学界争论土地国有制的前后，哲学界相继展开了孔子和庄子哲学的讨论。我对于孔子思想虽也有些想法，但因对春秋时的社会性质尚无定见，准备对这一问题稍有自信的理解之后，再加论述，所以没有参加孔子讨论的意愿。而对于庄子哲学的讨论，则很有参加讨论之意。因为二十年前，曾做过一些庄子考证的研究，写过《庄子考辩》的论稿。由于抗战开始，不愿继续搞脱离现实的东西，便长久搁置起来。1961、62年内，看到许多讨论庄子的文章，很想提出自己的意见参加讨论，因当时忙于教学，又正在写关于土地国有制的文稿，未得兼顾。1962年后期，结束了土地国有制问题的探索，于1963年初开始，把久已搁置的《庄子考辩》文言文稿重新整理起来，在政治学习、教学工作的交错中，以蜗牛般的速度从事整理，经过两年的时间，尚未将全书整理完毕，便开始了《海瑞罢官》的批判，接着是十年动乱，当然不可能有研究这些古老思想的余裕和兴趣了。

动乱的十年中，浪掷了宝贵的光阴，不能写也不想写一个字，

孔子思想、儒法思想本是平常研究的课题,但在所谓“评法批儒”的运动中,简直无一语可言,只能在悲愤的沉默中,静观运动的趋向,渴望着黎明时期的到来。

日夜盼望的争鸣曙光终于露出来了,这才舒了一口气,写了《论子产的政治改革和天道、民主思想》(曾在《社会科学战线》编的《哲学史论丛》登载)和《论春秋时代关于“仁”的言论和孔子的仁说》(载1979年《哲学研究》第十二期)两文,表达了我对评孔的意见。这两篇文章,都是在极左思潮高峰的空气下写的,特别是《论子产的政治改革和天道、民主思想》一文,更是直接对梁效的隐射文而写的,不免带有悲愤的气氛,但其主要思想在于正面论述,如论子产的政治斗争和春秋末期的社会变革,其中关于子产和司民等斗争的阶级性质,“不藉千亩”、“田有封洫”的内容和作用,井田制中的公田制和对彻法的不同解释,都曾提出自己的意见,特别是对于子产和孔子思想的联系,以及说明革新和僭越、革命和叛乱的不同,与评孔子有密切关系。所以这一文是我论述孔子思想的姊妹篇,不是一时风行的批判文字。不过其中第一节中有关王船山是否法家的论述,实系赘语,因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王船山是法家的说法已成为定论,在急切要消除这一谬论的情绪下,就乘此机会,举出铁证,写了这一段赘论,这是应该附带说明的一点。

关于春秋时期“仁”的三种类型说,和梁效评子产文的隐射意图不同,而是六十年代评论孔子的权威论断,孔子讨论会上的主要基调。社会上流行的孔子是代表奴隶主阶级的论调,即以此文为主要根据之一。这一貌似有理论和根据的文章,稍一认真分析,即知其全无处,特别是其第三类型中,以阳虎代表劳动阶级,以奸劫弑臣为仁说,更是为野心家找理论根据,必须予以批驳。所以当此文写出发表后,颇有一点完成了重要任务的感

觉,但对于春秋初期晋国的优施所说的“外人”之言,倒是一个确不同于孔子仁说的论点,我在文的末段,提出这个问题了,而对于此说出现的确实时期,不敢确定,这还是一个不断想到而未能解决的问题。

此两文写出后,对于评论孔子的主要思想,大体构成,因此当1980年初社科院哲研所的同志约我为《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一书写此题目,就欣然同意了。《孔子评传》的内容是将上两文中的意见和我对春秋社会的初步看法,结合起来,略加陈述,算是本书古代思想史部分的中心论题。这些意见是否正确,不敢妄说,可以一说的是这些意见是根据自己的“良心”认识写出,而不是在指挥棒下,仰承鼻息而写的,所以这一禁区的开放,确是国家政治革新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也是对于个人前进的一个鼓励。

在写《孔子评传》的前后(1980—1981年),曾将六十年代整理过的《庄子内外篇考论》发表了一部分,写完《孔子评传》后,将未完的《庄子考论》整理完毕,暂时结束了这部分工作。

这时历史研究所正在编辑《中华民族杰出的历史人物丛书》,负责思想史部分的唐宇元同志约我写一篇庄周传记,因时间紧迫,字数限制(约12,000字),我只将《新探》中的哲学部分,略加概括,写成《庄周》一文;即本书所题《庄周述略》之篇。本来该丛书是为青年读者写的,应该写的生动流畅、深入浅出,适合于青年的口味,可是该文未能脱出《新探》原书的体系,看起来颇不通俗,反不如我写《孔子评传》一文的流畅易懂,从青年读者的角度看,应该说是一个失败,但放在这一论集里,作为深入研究的桥梁,倒也合宜。

1981一年中,在海外学者的推动下,久被定为最反动的理学

禁区，也开放了。11月在杭州召开了宋明理学讨论会，在参加该会的前夕，写了《略论理学的要旨和王夫之对理学的态度》一文，表达了我对理学本身和张载、朱熹、王夫之思想的一些看法。我对于理学的性质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当五十年代中，有一些初步看法，在《评胡适“反理学”的历史渊源和思想实质》一文中，曾略有论述。（见《哲学研究》1956年第2期及本书）但在一连串的批判运动中，特别是十年动乱中，未能详细考虑，写出论文。这次正式讨论，精神十分振奋，但乍一提笔又不知该从何处谈起，当时心目中最具体的意见，是在报刊上常看见王夫之是反理学的提法，觉得和自己的想法不同，因就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说明王夫之的基本主张，属于理学范围，王夫之对程、朱主张虽有不同意见，但他对于程、朱的尊重仅次于对张载的尊重，并不是积极反程、朱的。该文在会议期间，应《中国哲学》编委之约，交由该刊发表，后因该刊出版周期较慢，于1982年夏在《中国社会科学》第三期上刊出。其中涉及问题颇多，尚须深入研究，方可逐步解决，但可庆幸的是多年不为人所讨论的问题又可以公开讨论，并可提出不同观点，这不能不说是学术思想上的一个进展。

1983年中，写了《章太炎对于二程学说的评论》一文，是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经济思想研究所、西北大学等单位在西安召开的中国思想史讨论会时提交的。该会的讨论重点，是关于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同点和区别。我对于这一问题没有研究，并且有一种偏见，认为抽象地讨论方法，很容易走到空洞无实，得不到结论的地步。似不如提出一个具体例证，从实际问题上说明两者的同异，或者对于解决这一理论有些帮助，当时为了研究理学问题，看了章太炎《检论》中的《通程篇》，一方面觉得他评论二程理学有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对于现在讨论理学有

一定指导意义；一方面觉得章氏此文夹杂着许多有关经学、文字学和历史学问题，正可说明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同异。因此，除了论述章氏对二程的评论外，在全文的末尾，添了一段论思想史和哲学史同异的文字，这是为了参加这一会议而这样写的。我对于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说，早认为一般解释为禁欲主义和事实不符，但又恐自己可能是受传统成见的影响之故，还不敢公开写文。重读了章太炎此文后，想到章太炎并不是一个理学家，而且是属于清代正统考证派，他的话应该没有宋学偏见的，引述他的论断，用以纠正一般人的误解，会有一些效力，这就是写那一文的初步设想。

《论宋明哲学中的“存天理、去人欲”说》一文是1985年冬写的，1986年春发表在《哲学研究》第三期上。十年动乱期间，在一些专业书或报刊上，有人说“存天理、灭人欲”说，是让老百姓束紧腰带过吃不饱饭的生活，我认为这是有意曲解，不值一论；但在三中全会后，仍然在一些会上听到这种论调，不禁感到思想的混乱，到了急应澄清的时候。由于对理论的细节，没有十分弄清，同时在下意识中，和一些学者一样，还有些顾忌，故迟迟未能动笔。直至1985年冬，才鼓起勇气写成此文，结论可能有不少错误，但总算打开沉闷的气氛，把理学的核心问题，郑重加以讨论了。

继续这一研究于1987年春写了《顾宪成简论》一文，论述了顾宪成的救世精神及其对朱、王两派学说的继承和评论，认为他是朱学信徒而不是调和派。认为他从“有我”“无我”的角度评论朱陆，比前人的评论都为深刻，特别引起我写此文的是《东林列传》作者陈鼎所述顾宪成提倡起来的社会上痛击贪污的风气，确实产生了社会效益，而不仅是理论空谈，个人认为一切关心中国文化或反对中国传统者都应对此点有所认识。

近一年来，社会上有一种反传统文化的空气，似乎认为中国的衰弱腐败，都原于儒家，封建腐朽思想和儒家思想完全一样，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重要的问题。偶翻《严复集》，看到两篇评论道学的文章，觉得两文的见解，对于纠正现在这一趋势，可能会有澄清混淆的说服力量，因此于1988年夏，写了《严复对于当代道学家和王阳明学说的评论》一文，希望人们（包括学术界和一般人）对严复两文有所重视。近来海内外学者讨论中国文化时，多提到文化的价值系统，一些同志认识到继承孔孟精神的新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要点之一，我们应该批评其陈旧部分而阐明其精华部分，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扬光大，因此最近写了《王夫之天人学说探微》一文，阐明这种精神。

另外二篇短文的写作经过是这样的：1986年参加河北省董仲舒哲学讨论会时，有一段发言，后来刊印讨论集时，依照发言写了一篇《对董仲舒思想的一些看法》的短文。1988年洛阳召开洛学讨论会时，曾寄给该会一段书面发言，内容是略谈二程思想的异同，曾载在《中州学刊》1988年第5期上，为了后来参考，一并收入书中。

除了上述各篇属于古代史的范围外，另有二篇论文，是五十年代所写有关现代思想的评论，即《评胡适“反理学”的历史渊源和思想实质》和《论中国接受实用主义影响的社会基础与思想联系》。其中，评胡适“反理学”一文的内容和我对理学的看法有内在联系，目的在于辨析对宋学的评价，这一看法至今没有改变。论实用主义一文，是由于听了雷海宗先生一次论中国没有接受实用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的发言，认为比一般看法较为深刻，但还有些不同的意见需要提出，文章内容主要是依照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当时国内对实用主义的看法，结合自己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认识而写的。现在我读了杜威《人的问题》等书后，在对

实用主义的认识与文此所说略有不同，但对中国有接受实用主义影响的实际之看法，没有大的改变。

另外有四篇附录，是三十年代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时的作业论文。其中(1)《六朝儒经注疏中之佛学影响》一文，是进修陈寅恪先生讲授《佛教翻译文学》课的学年论文；(2)《读〈世说新语〉札记》，是进修陈先生讲授《世说新语》和《魏晋哲学文学》课的学期作业；(3)《庄子与斯宾诺莎哲学之比较》，是进修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研究》课的学年论文；(4)《共工洪水故事和古代民族》，是进修闻一多先生讲授《中国古代神话研究》课的学年论文。

这四篇文章，除第三篇曾于1946年在《文艺与生活》上登载过外，其余三篇，都没有发表过。从内容性质上讲，前三篇是讨论思想的，和前列思想史部分，性质相同。第四篇和社会文化两方面都有一定联系，所以也放在本书附录中。

从四篇文章的内容价值看，四十余年前的作品，当然谈不到什么新时代的学术价值，不过由于是自己用过一番心的劳动成果，总有点敝帚自珍的私见，从这个私见出发，觉得其中谈到的某些问题（如魏晋玄学和名理学），当时还没有现在这样普及，有些论题，一直没有多少人讨论过（如儒经注疏中的佛教影响）。有些引用过的材料，对于自己以后的研究，可能还有少许参考价值，可以节省一些搜集的时间。有些分析和推测，在本文中虽没有构成系统而圆满的结论，但或许可以引发后来的新见。因此，为了将来的参考和过去的回忆，愿意保存下来。特别是这几篇文章，曾经过几位大师的指导评阅，与个人的平常作业意义不同。三位导师中，除冯先生健在外，陈、闻二师，都已先后作古，闻先生是成为革命烈士而牺牲的，陈先生也是十年动乱中折磨而死，面对尊敬者手批过的文稿，不忍轻予废弃，这就更有保存纪念的意义。

由于年龄精力关系，不可能遵照导师的指示，重新对久未思考的问题，钻研改作，所以这几篇附录，主要是纪念和回顾的意义，谈不到学术价值，这也是应该向读者声明的一点。

本书承张岱年、胡如雷两同志的督促，开始编辑，编印时烦王立玉同志从北京大学图书馆旧期刊中复印了《庄子与斯宾诺莎哲学之比较》一文，由陈慎同同志，和梅兴祚、马涛、陈丽同学等抄录整理，编成此集，并致谢忱。

1988年10月

目 录

自序·····	1
试论两汉时代的社会性质·····	1
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讨论中的若干问题·····	94
关于中国哲学史中唯心、唯物主义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	128
论子产的政治改革和天道、民主思想·····	139
论春秋时代关于“仁”的言论和孔子的仁说·····	170
孔子评传·····	192
庄周述略·····	235
对董仲舒思想的一些看法·····	253
论宋明哲学中的“存天理，去人欲”说·····	257
浅谈二程思想的异同·····	272
顾宪成简论·····	276
略论理学的要旨和王夫之对理学的态度·····	292
王夫之天人学说探微·····	304
章太炎对于二程学说的评论·····	313
严复对于当代道学家和王阳明学说的评论·····	323
评胡适“反理学”的历史渊源和思想实质·····	336
论中国接受实用主义影响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联系·····	369
〔旧作附存〕	
六朝儒经注疏中之佛学影响·····	389

DI42 / 16

读《世说新语》札记·····	411
庄子与斯宾诺莎哲学之比较·····	419
共工洪水故事与古代民族·····	450

试论两汉时代的社会性质

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的问题，是二十多年来争论不决，而目前各方期待及早解决的问题。在最近的论辨中，虽然还有非常分歧对立的见解，但并不是没有一定程度的进展。问题的全面解决，当然需要各方面的长期努力，但在全面解决的条件没有成熟之时，每一个历史工作者，各就自己的知识范围，提出一些不一定成熟的意见，对于促进全面解决的及早实现，不是没有帮助的。因此本文敢于提出个人对于汉代社会性质问题的一些看法，请教于史学界的前辈和同志们。

一、区别奴隶制跟封建制和区别 奴隶社会形态跟封建社会形 态的标准问题

在没有讨论到汉代社会性质以前，应该先说明一下什么是区分奴隶制跟封建制的标准，和什么是区分奴隶占有制社会形态跟封建制社会形态的标准。

前一个问题所讨论的是两种经济体系不同的标准；后一个问题所讨论的是两种社会经济形态不同的标准。经济体系（或社会经济样式）所指的内容是：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体系，也即是经济样式或经济结构；社会经济形态的内容，所指的是：“包括着特定历史时代底经济诸关系之全部具体的丰富性、多样性、